

靜安先生史席開
先生曾一至天津正街奉謁對已降
京懷甚得吳君書知
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玉慰考試今題
事標中而批有以云云因家中自
人進行此一句內頗頗後不能用心
於向學以乞

最敬慕 梅先生 先生主說 梅先生在
本校前之人極大辱 王不才前未風以
教以 先生之也 國學之智相若 恨教
二名 任公之教 於去歲時於貴西原後
日業 惟以今日可詢或五名是長耳 明最
夢校前出步 其於此約表暢暢 一之
生 可也 此校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第二十一輯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 第二十辑 ·

主编 徐中玉 郭豫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辑/徐中玉,郭豫适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ISBN 7-5617-3030-6

I. 古... II. ①徐... ②郭... III.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597 号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辑)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责任编辑 钟明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7-5617-3030-6 / I · 265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徐中玉 郭豫适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齐森华 朱良志 张少康

张伯伟 胡晓明(执行编委)

黄霖 曹旭 蒋凡

蒋寅

目 录

◆ 竹书与诗学 ◆

- 竹书《孔子诗论》刍议 俞志慧(1)

◆ 庄子与文论 ◆

- 从时代背景看《逍遥游》本义及其对中国艺术精神的
唤醒 汪春泓(17)
庄子逍遥义的历史演变 方勇 李波(37)
说《庄子》之“忘”
——心灵的净化和无差别境界的追寻 涂光社(51)
《庄子》中的神秘主义 包兆会(68)

◆ 儒家思想与美学 ◆

- 试探《尚书》中的美意识 陈良运(82)
“成人”与审美——儒家诗学的终极价值 李 凯(96)

◆ 域外诗学 ◆

- 9世纪早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
..... 宇文所安著 郭茜 陈引驰译(109)
向文学批评的习惯范式挑战
——读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象：自传诗》 程亚林(124)

◆ 六朝、宋诗学与文论 ◆

- 论左思“美物者贵依其本”的品物征实主张 姜剑云(138)
- 从“弼中彪外”说到“才胆识力”说 孙蓉蓉(147)
- 从《沧浪诗话》“于诗用健字不得”考辨严羽评杜甫 ... 周兴陆(163)
- 宋诗的尚意与宋文的尚韵 韩泉欣(171)
- 宋金元诗学与世界诗学的格局 张思齐(181)

◆ 元明清及近代诗学、词学与文论 ◆

- 关于元代诗歌格法类著作 刘明今(209)
- 论《唐诗品汇》的唐诗观
- 兼谈唐诗研究的若干问题 李 庆(219)
- 明代诗学文献的文体形态 朱易安(243)
- 孟称舜的编剧理论及美学思想之我见 徐子方(255)
- “锐利的巧思”
- 晚明小品机智话语特征略论 王 恺(263)
- 今所适有何必无
- 金圣叹接受文学观 邬国平(272)
- 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 汪涌豪(284)
- 杜濬与清初遗民诗学 陈水云(302)
- 清代女性婉约词学观及女性婉约词创作中的性别
- 意识 王力坚(317)
- 近代词家对词体地位及体性的思考 杨柏岭(327)

◆ 诗学宏观 ◆

- 赋心·诗心·词心·文心
-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心灵化阐释 李中华(345)
- 虚静·养气·神思
-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三题 李 平(353)

情礼·情文·情景

- 先秦至唐代诗学发展的一条线索 钱 钢(363)
-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解读 张 皓(377)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

- 研讨会综述 (387)

竹书《孔子诗论》刍议^①

俞志慧

在《孔子诗论》^②面世之前,文献所见有关春秋时期讨论《诗》或诗的材料多从诗的应用(如宴享赋诗、言志引诗)着眼,讨论诗歌文本的文字虽亦偶尔得见^③,可这些雪泥鸿爪般的记录,很难使人相信当时人们对诗歌有过大量的文本意义上的关注;但是,到了《孟子》一书中,就有了“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具有成熟的方法论意义的命题,下迄两汉,释《诗》之学与传注其他先秦典籍的学问一起,共同形成一门经学而蔚为大观。从春秋到孟子再到两汉释诗之学,其间的过渡环节茫昧无考,《孔子诗

① 关于《诗论》“子曰”前一字的隶定,曾经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据其字形认为应归于卜子,即孔子弟子子夏,甚至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子上,即子思的儿子。笔者在引用诗论首简时也曾主卜子说(见拙文《孔门言语科考论》,台北,《孔孟学报》第79期,2001年9月28日出版)。李零先生为此专门拟撰写了《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见于北大考古中心网站,2000年11月)一文,文中据《诗论》上下文中有鲁哀公和子羔向事主请教的文字,断其必为孔子。本人去上海博物馆请教濮茅左先生,濮先生提出六朝之前无卜子之称呼以及同批竹书中同样书法的地方只能判断是孔子等几条证据,也认为必为孔子。上海大学朱渊清博士先有《“孔”字的写法》一文载于庞朴先生主持的“简帛研究”网站,后又在电话中告知笔者。朱渊清据《集韵》、《古文四声韵》、《隶辨》、《尚书隶古定》释文、《中华大字典》等书中“孔”字亦书作从“子”从“人”,谓竹书“子曰”前之字必为“孔”字,其说最为有力。基于上述,本人改持“孔子”说。

② 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③ 从现有文献看,直接讨论诗歌文本的仅有《国语·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中晋叔向引释《周颂·昊天有成命》全诗和《大雅·既醉》第六章两处。

论》的面世,使这个过渡环节有可能得到呈现。本文拟以《孔子诗论》的这一过渡色彩为切入点,考察《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和在诗学思想上的贡献。

一、从诗乐一体到单独论诗

如果将吴公子季札观乐评乐^①与《孔子诗论》对照阅读,就不难发现,后者从思维方式到话语系统都是前者的忠实继承者,譬如以“盛德”、“思深”评价讨论对象,以“犹有”表示对讨论对象尚存在一定的保留态度,试将二者的相关条目对比如下:

第一组:

《清庙》,王德也,至矣!(第五简)

《颂》,坊德也……《大雅》,盛德也。(第二简)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偏,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札评乐)

见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帡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季札评乐)

第二组:

《颂》,坊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侃,其歌绅而眇,其思深而远,至矣。^②(第二简)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季札评乐)

① 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② “侃”和“眇”字之隶释请见拙文《〈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校笺(上、下)》,见“简帛研究”网: <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2/yuzhihui01-2.htm>,又刊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台北)编《经学研究论丛》第11辑。本文引《孔子诗论》之文若与马承源先生主编《战国楚竹书》有出入又未出注者,皆请见《〈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校笺(上、下)》。

第三组:

淇(其)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第十九简)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季札评乐)

见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季札评乐)

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季札评乐)

然而,文字上的雷同并没有遮蔽《孔子诗论》开创性的光芒,最突出的一点是关注对象已发生了从乐到诗的转移,孔子用了这个旧瓶,装的却是新酒,这样一种继承过程中的创新使得《孔子诗论》成为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段论诗文字。

从深层次看,这一关注对象的转变其实为以下两个历史性变动所诱发:一是王官之学的式微与私人设帐授徒的兴起(在这以前的文献中,未见有关于私学的记载,当然亦无私人设帐授徒教学诗歌的记载);二是孔子身处春秋赋诗传统终结之后,诗的实用价值面临挑战。基于这两点,《孔子诗论》就有可能在这残缺不全的29枚简书之外,隐含着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

先说后者,玩季札观乐之序和评乐之语,则可知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的鲁国,《诗》之各部分皆可演奏,其时孔子尚在童年时代。

然而,也就是在孔子时代,礼已崩、乐已坏,从礼一面看,如孟子所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①从乐一面看,《论语》有一则记载乐师流失的材料反映出问题的严重:“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②从诗、礼、乐合一的春秋赋诗传统看,文献所见最末一次述古意义上的赋诗是在鲁定公四年(公

① 《孟子·万章下》。

② 《论语·微子》。

元前 506 年,此年孔子 46 岁)秦哀公赋《无衣》;倘若如有的学者认定的这次的赋属“造篇”或非“述古”,则最后一次赋诗活动发生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17 年,此年孔子 35 岁),宋元公享鲁三桓叔孙昭子,为赋《新宫》,昭子赋《车辖》以对^①。即便以前一说为准,下距《春秋》所记最末一年公元前 478 年尚有 28 年,与《左传》所记最末一年公元前 453 年则达 53 年,在这个长时段内,以《左传》对赋诗记载的密集而论(据笔者统计,《左传》共赋诗 58 首 69 次),假如其间有频繁的赋诗,作者不可能一字不记。因而,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在春秋的最后半个世纪中^②,绵延至少百五十年的赋诗传统^③已经终结。

由于礼乐制度事实上的崩坏和朝聘盟会宴享赋诗活动的消歇,使得有“圣之时者”之誉的孔夫子在“克己复礼”、“正乐”^④的同时,应时顺势地将诗从诗乐一体中独立出来(《孔子诗论》中虽亦偶尔提及诗之乐,如第二简“其乐安而侃,其歌绅而眇”,但绝大多数都是论诗旨和文词),一方面反复强调习诗的重要性,如“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⑤。另一方面又在教学活动中以诗歌文本为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使得《诗》三百篇不致因为礼崩乐坏而湮没不彰。可以认为,这当中体现着孔子在历史转折关头斯文在兹的使命感和维系礼乐文明于不坠的担当精神。

其次,孔子论诗以诗歌文词而非诗乐为主,还有其私人教学活

① 详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② 《史记·六国年表》上限为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5 年),《左传》、《国语》、《春秋事语》、《资治通鉴》皆以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453 年)三家分晋为春秋之末年,本文以后者为据。

③ 据现有文献,《左传·僖公廿三年》秦穆公与晋公子重耳之间的外交飨赋为最早之赋诗,是年在公元前 637 年。

④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媒体披露,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还有《孔子乐论》。

⑤ 见《论语·季氏》、《论语·阳货》。

动本身的原因。与王官之学相比,孔门私家授徒在礼数和排场上都会有更多的限制,《周礼·春官》“大司乐”和“乐师”所载的那种讲究,在孔子是不可能做到——有时甚至也是不应该的;其次,作为教育门人弟子的教材,诗乐和诗文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二者不能互相替代,音乐易于让听者沉浸其中,受到熏陶;而诗歌文本却能藉意境、形象使吟诵者出乎其外,如《论语》所载子夏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联想到“礼后”^①,这种启示作用是音乐所无法企及的。而孔子读诗尤其强调“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此及彼的联想和想象功夫。从这一点看,孔子不仅将诗看成礼乐文明的结晶,而且也将诗作为传承文明、培养君子儒的重要工具,显然,在这一意义上,诗的地位已不是今天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所可比拟。

二、以诗歌语言为主要讨论对象

既然从诗乐一体中独立出来单独论诗,就要从音乐的调性和旋律转入诗歌语言,这当中包括“言”了什么和怎样“言”两方面,前者指向诗的内容,后者指向诗的语言风格。这两方面孔子皆注意到了,并且都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如:首简“文亡(毋)隐言”,第二、三简谓颂、雅“多言”,第三简“邦风,其言文,其声善”,第八简“《十月》善諝言”、“《小旻》言不中志”、“《小宛》其言不恶”,第十七简“《东方未明》有利词”,第十九简《北门》有怨言,第二十简《木瓜》“其言有所载而后纳”,第廿三简“《鹿鸣》以乐词”,第廿五简“《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第廿八简又谓“《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其中有原则性的命题,如“文亡隐言”;有对《诗经》语言风格的一般性评价,如谓邦风“其言文,其声善”、颂、雅“多言”;更大量的则是对具体诗章语言风格或写作方法的评价。

^①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诗论》的简文大多残断,为了准确、全面地把握其中的言语思想,有必要将简文与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材料中讨论言语问题的命题进行参证,尤以统合孔子及其传人关于言语问题的言说为最重要,其在先秦言语思想中的地位,亦需从这种参证、统合中凸显,以下试将二者作一简单排比:

第一组: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第一简)

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荀子·劝学》)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诘取也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孟子·尽心下》)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①(《周易·系辞下》)

第二组:

邦风,其入物也博,观人欲焉大,金在焉。其言文,其声善。(第三简)

《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荀子·大略》)

第三组:

《东方未明》有利词。(第十七简)

《小宛》,其言不恶,少有秀焉。(第八简)

^① 饶宗颐先生《竹书〈诗序〉小笺(二)》(见“简帛研究”网)释“隐”为“吝”,并引证帛书《易》这一段话云:“‘亡吝志’即尽意之谓也,‘亡吝情’即尽情之谓也,‘亡吝言’即尽其言之谓也。以《易》证诗,十分明白晓畅。”从文义看,释“吝”与释“隐”无大别,将《易传》此文释证《诗论》“三句偈”(饶先生语),则十分精当。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

仲尼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曾子言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

第四组：

《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第八简）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

诗以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语）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下》鲁乐师师亥语）

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

第五组：

《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第二十五简）

《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第二十八简）

将叛者其辞慚，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其善者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周易·系辞传下》）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从以上五组对比中可以发现，《孔子诗论》中所涉及的言语思想已经覆盖了先秦儒家言语思想的大多数命题。虽然相关思想在此前的文献中也有类似表述，但《孔子诗论》的出现，使得那些原本零散的命题有可能得到整合和贯通。譬如：“知言”，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最早只在《孟子》中出现过，然而，在《孔子诗论》中出现二

次,其中评《大田》卒章一句最与先秦“知言”之说相近,因为有了这一条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孟子的知言思想至少还可以追溯到孔子;若与《逸周书》所记周代王官相人之术^①和孔子察人之道^②合观,则不仅“知言”思想的承传脉络变得清晰起来,而且,由此还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技巧在前期尚属一般的观人之术,只是到了孔门,才将观人之术与释诗之学结合,变成了语言分析的方法,并越到后来越变得细密和专业化。仅此一点,即能凸现出《孔子诗论》在先秦言语思想中的地位。又譬如,荀子在《大略》中谓《小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用语酷似孔子对邦风的评价:“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对邦风何以“声善”没有解释,而荀子则说明了何以谓《小雅》“声哀”的理由——“疾今之政以思往者”,这里依然能看出先后相继又走向细密深入的学术承传关系,汉儒谓荀子诗学出于七十子弟之后,因此又多一条新证。

当然,这里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对言语思想的贡献,同时也是对文学思想的贡献。理由之一:考虑到以下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孔子之前尚无有为文之例,孔子之后方始有围绕一个中心统一构思谋篇布局者,则其时对话语的研究应视为后世对文章和文学研究的雏形,譬如《尚书》许多篇章之前有序言性质的文字,《逸周书·商誓》和《毛公鼎》都反复出现“王曰”、“王若曰”等字样,皆可见早期文献多是史官对某些重要人物若干次言语的记录、整理和分类(如祝祷、诏告、格言、外交辞令)汇编,这种编辑思想无疑也嘉惠后来的文章学。因此,《孔子诗论》对话语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后来意义上的文学的态度。理由之二:《孔子诗论》所讨论的言语对象已由《尚书》、《逸周书》等的政治应用性言语过渡到诗歌语言——这一过渡本身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与这一组简文相关的一系列言语命题至此正式

① 见《逸周书·官人解》。

② 譬如《论语·为政》云: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获得了中国文学经典命题的身份,《孔子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于焉可见。

三、以培养君子人格为授诗目标

孔子言语思想在古代文论上的贡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孔子论诗释言的初衷不在文而在人,或者说是借诗歌语言背后的意义以立人。

《国语·楚语上》有一段文字记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其中讲到诗时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①在这里,诗被看成是迁善改过、陶冶情志的媒介,到了孔子,其授诗对象的社会成份相当庞杂,再也不像王官之学那样限于太子或者《周礼·春官·大师》所载的贵族子弟,但其教学的目的仍一本此前官学设定的高标,用孔门自家的话说就是“识其大者”“为君子儒”^②,具体而言,是授之以政能“达”,使于四方能“专对”^③;“迹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④

基于这样的目的,就可以理解孔子授诗时何以没有教弟子如何作诗(先秦文献中迄未见作诗之学,原因也正在此),或者如何审美,而是反复强调作为君子儒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即使诗歌文本中未必有这样的“原义”,孔子也会刻意发掘其中的“蕴义”,《孔子诗论》中的一些高频词如德、智、礼、情、性、信等并非都能在相应的文本中得到安顿,即可为明证,譬如简十二谓《关雎》“好反入于礼”,文本中其实推不出此意,因为钟鼓、琴瑟皆可为礼乐之器,故孔子

① 《国语》,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5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② 《论语·子张》: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③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④ 《论语·阳货》。

将“寤寐思服”、“转辗反侧”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过程指认为“入于礼”。历史地看,孔子这种释诗思想是对春秋用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且看以下文献:

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猷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猷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

(《国语·周语下》)

叔向评《周颂·昊天有成命》和《大雅·既醉》的二段话,为今天仅见的孔子之前释诗材料,若按照训诂学或者文本释义的标准,其中许多未经论证的断语多有可商,但用诗者不过以释诗为手段,借以表明当下的思想,所以并不为文本的“原义”所限,而着意于其“蕴义”的发掘,这一点在下文《左传》君子之言和孔子对《文王》二句诗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君子曰:“……《风》有《采芣》、《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左传·隐公三年》)

(仲尼)曰:“《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从上引材料中,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息,其时的诗歌解释除了指向君子德性修养而外,在论释方法上还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对这种诗歌蕴义的揭示,文中并没费多少笔墨,相反,只是以一二个关键字作概括。这种做法,在《孔子诗论》中也得以发扬光大,简文从